



早期蜀文化和汉水上游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宋治民 (四川大学考古系)

早期蜀文化分布在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包括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两个阶段,年代相当于商代、西周、春秋。这是相对晚期蜀文化而言,晚期蜀文化指相当于战国、秦至西汉初年。

汉水上游的城(固)洋(县)地区很早就有青铜器出土,自20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城洋地区大量青铜器出土,引起学术界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使人们对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提出汉水上游与三星堆文化大体同时的青铜文化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城固宝山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宝山文化的命名,宝山文化是宝山遗址的主要遗存,大约相当商文化的二里冈上层至殷墟文化三期。正如发掘报告指出的:“宝山商时期丰富的遗迹遗物反映出它是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遗存”。并且此类遗存在汉水上游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同时通过宝山遗址的发掘,还认识到宝山文化和城洋铜器群“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①。“认为城洋铜器群应为宝山文化的组成部分”^②。这样就使得人们对汉水上游的青铜文化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对于探讨三星堆文化也大有裨益,对十二桥文化的研究也有帮助。

宝山文化的烧烤坑独具特色,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还未见到过,为本文化的特点之一,并且在宝山遗址的龙山文化阶段已有发现,可证其为本地区的独有遗迹。

本文拟从两地区的陶器、青铜器入手分析这两个青铜文化的关系。

一、三星堆文化与宝山文化

1. 陶器 陶器为古代人们使用和生产最多的、也是考古发掘中出土最普遍的器物。不同文化的陶器总是有其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了一个考古

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的生产水平、生活需要、习俗,他们的审美情趣,甚至他们的一些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正如俞伟超先生指出的:“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所决定的”^③。但同时也应看到一些时代相近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地域相近或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会有某些文化因素相似或相同。夏鼐先生在谈到齐家文化时曾指出:“它(引者按:指齐家文化)和马厂——半山文化的相同点,大都是一般性的,是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文化所共有的,例如陶器多红陶,常有绳纹,农作物以小米为主。但是它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共同点,例如双大耳罐(杯),绳纹侈口褐陶罐等,却有明显的特殊性,表示一定的文化关系。”^④夏先生这里指的是新石器文化,其道理在研究青铜文化时也是一样的。这些原则是我们研究考古学文化时必须注意和遵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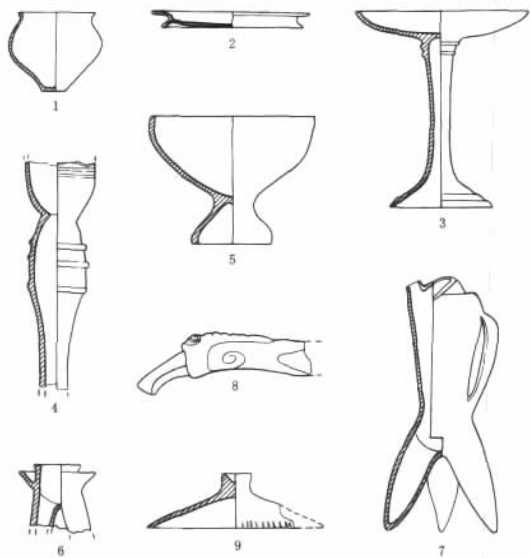
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第4层、第3层(第三、第二文化层),第2层(第一文化层),即三星堆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命名的,已得到大多学者的认可。虽然目前有关三星堆文化的材料尚有许多未公布,但就已发表的材料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情况。

陶质 以夹砂陶为主,有红褐陶、灰褐陶、灰黑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有灰陶、橙黄陶和红褐陶。

纹饰 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凹弦纹、网格纹、镂孔等。

器形 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高柄豆形器座、圈足盘、鸟头柄器、、器盖、甗形器(图一)、其它尚有瓶、杯等,以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盘、鸟头柄器为基本组合^⑤。

宝山文化是以汉水上游城固县宝山遗址的商时期遗存命名的,从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看,其陶器和



图一 三星堆文化出土陶器

1. 小平底罐(DaT2③:15) 2. 圈足盘(DCT1③:2)
3. 高柄豆(AaT4②:39) 4. 高柄器座 5. 圈足豆(DaT2③:34)
6. 甗形器 7. 壶(CbT6②:41) 8. 鸟头柄器 9. 器盖(采:15)

三星堆文化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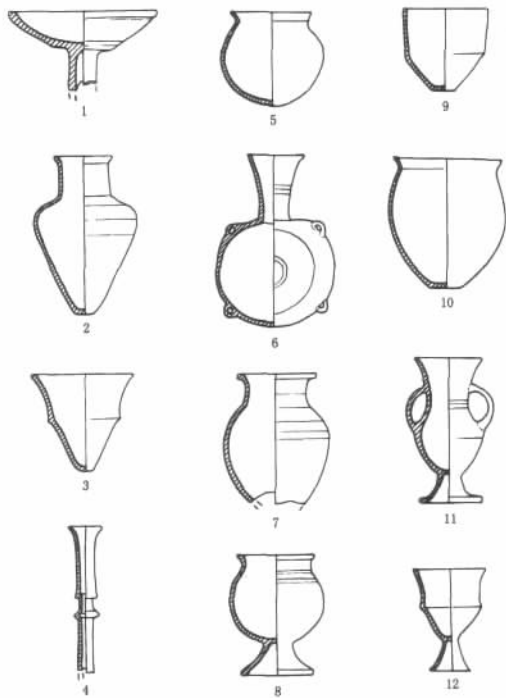
陶质 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其中夹砂褐陶占总数的35.73%、夹砂灰陶占3.94%、其它尚有少量夹砂黑皮灰胎陶和夹砂黑皮红胎陶，泥质灰陶占25.04%、泥质黑皮灰胎陶占26.18%、泥质黑皮红胎陶占6.44%。

纹饰 绳纹为最常见，其它有线纹、篮纹、方格纹、阴弦纹、凸棱纹、三角形折线纹、圆饼饰、圆形镂孔、十字镂孔、贝纹、蛙纹、鸟纹、目纹、卍纹、短直线纹、窝状纹、指甲状印纹、联珠纹^⑥。

器形 据《城固宝山》一书对典型遗迹单位出土陶器的统计，出土总数在100件以上的有豆（高柄豆）243件、高领小平底尊138件、小底尊形杯199件、高柄器座117件、釜347件（图二、1-5），这几种陶器不但数量多，并且从早到晚都有出土，显然它们应是宝山文化陶器的基本组合。还有一些陶器出土数量不算多，但它们都贯穿宝山文化的始终，如扁腹壶、圈足罐、大口深腹罐（图二、6-8、10）也应视为宝山文化陶器组合的组成部分。另外有些陶器只在早期或晚期出土，数量也较少，但其形制独特如有圈足尊、高圈足尊形杯（图二、11-12），其它还有长颈圈足尊、甗、簋等^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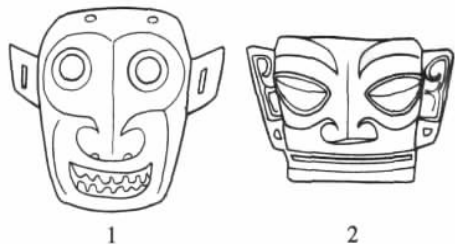
以上通过三星堆文化和宝山文化陶器的对比，可以看出虽然在陶质和纹饰方面有些相同的地方，

但它们只是少数部分，更多的是不同的。在器形方面总的看三星堆文化陶器种类相对较少，宝山文化的陶器却是种类繁多。从器形看，它们各自有自身特点的器物群，例如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圈足盘、三足形器、鸟头柄器、瓶、平底盘等均不见于宝山文化。而宝山文化的高颈小平底尊、扁腹壶、有圈足尊、高圈足尊形杯、小底尊形杯、釜、圈足罐等也不见于三星堆文化。它们的基本组合也不相同。虽然高柄豆在三星堆文化和宝山文化中都有，但高柄豆这种器物在我国新石器文化和商周文化中出土较为普遍，不同地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出土，且宝山文化的高柄和三星堆文化的高柄豆细部也不尽相同，如宝山文化高柄豆的豆盘绝大多数口沿呈外折或外侈，三星堆文化高柄豆的豆盘多为敞口，再如高柄器座，三星堆文化称为高柄豆形器座，可分为两种，一种从外形看，就是一件高柄豆，豆盘呈碗状，只是豆盘底部有孔和空心柱状高柄相通；另一种豆盘呈杯状，底部和空心柄部相通，其柄部呈“线锭”状。宝山文化的高柄器座相当豆盘的部分显得细而深，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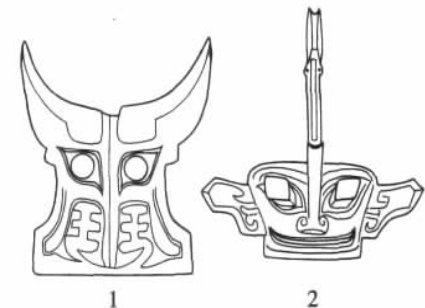
图二 宝山文化出土陶器

1. Ab型豆(SH6:4) 2. 高颈小平底尊(SH19:14) 3. Ab型小底尊形杯(SH47:10) 4. 高柄器座(SH27:58) 5. 釜(SH19:21)
6. 扁腹壶(SH20:21) 7. Aa型甗(SH9:81) 8. A型圈足罐(M7:1) 9. C型小底尊形杯(SH9:32) 10. 大口深腹罐(SH57:12) 11. 有圈足尊(SH8:20) 12. 高圈足尊形杯(SH8:34)



图三 人面具

1. 城洋(1976SHBSXT:22) 2. 三星堆B型(K2②:153)



图四 兽面具

1. 城洋(1976CHBSXT:25)
2. 三星堆A型(K2②:144)
3. 三星堆A型兽面(K2③:217)

呈杯形,底部和中空的柄部相通,柄部结节明显。除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外,其差异是主要的、明显的。从整个陶器的器物群看,它们的文化面貌不同。前文提到人们生产一种物品是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这就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先民和宝山文化的先民在生产、生活、习俗等各方面是不同的。他们是不同的人们共同体。

2. 铜器 青铜器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达到了顶峰,我国广大地区有许多重要发现。在汉水上游的城(固)洋(县)地区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都有发现。

城洋地区很早就有青铜器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有铜器出土,据统计总数达710件,这些铜器虽非发掘品,但都有具体出土地点。并且宝山遗址的发掘已认定这些铜器归属宝山文化^⑩。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一批青铜器,一号坑178件、二号坑735件,共计900多件^⑪。

城洋青铜器经研究其时代为商代,和宝山遗址商时期遗存时代一致;三星堆青铜器出于祭祀坑,笔者曾根据坑的开口层位和一号坑内出土陶器,推测

两坑均属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而三星堆四期属十二桥文化,但同时也指出两坑铜器铸造的时代早于两坑本身的年代^⑩。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铜器,“大约铸造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或更晚些。”有学者指出:“它们都不是专为这两次祭祀而铸造的祭祀用品和用器,而是原来在宗庙中,各自经过数十载乃至上百载的使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宗庙用器。”^⑪可见两坑铜器的年代要早于坑本身的年代。而“周初的青铜器,以器形和纹饰而言,因袭商人遗风非常明显。”“在克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手工业和工艺奴隶,这些转而成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至少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⑫。因此城洋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城洋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都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器物;一部分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器物。

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城洋青铜器中主要有八人面饰、兽面饰、弯形器、璋形器、铜泡以及兵器中的三角援戈、有銎钺等;三星堆青铜器中主要是神树、面具、人像、龙柱形器、虎形器、兽面具、神坛以及援部呈锯齿状的戈形器等。这两地的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在种类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分见《城洋青铜器》和《三星堆祭祀坑》。即使是同类器物两地区别也很明显,例如人面具,城洋青铜器中的人面具为椭圆形,仿人面目形状,圆眼、阔鼻、大嘴、牙齿处镂孔,近长方形两耳靠近头上部(图三,1),三星堆青铜中的人面具为方形,宽额,大眼,眼角上斜,直鼻,阔口不露齿,长耳(图三,2)。再如兽面具,城洋青铜器中的兽面具形似牛首,两角粗状,直鼻大口,大眼,鼻梁两侧铸出“王”形(图四,1)。三星堆的兽面具,形体高大,方颐,大眼,眼球呈圆筒状伸出,高鼻,阔口,前额有夔形装饰(图四,2),另有一种《报告》称为兽面,实际上也是一种兽面具,其基本形状为模仿铜器上的兽面(饕餮)纹,它的双角完全同于兽面(饕餮)纹的双角,双夔纹组成面部,夔纹的躯干高扬内卷,直鼻,大眼,阔嘴露齿,夔形双耳(图四,3)。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两地出土青铜器中属于地方特色的器物无论从不同的类别或是同类器物的具体形象都完全不同。可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造型和风格。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主要是用于宗教、祭祀及礼仪方面的活动,它们的这种差异是宝山文化的人们和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在习俗、信仰、宗教、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不同,也就是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人们共同体。从这方面看,说三星堆文化向北分布到汉水上游地区是缺乏根据的。

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两地均有发现,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差异。首先,在器物类别上。城洋青铜器种类要多,三星堆青铜器种类较少。城洋青铜器有鬲、鼎、簋、甗、尊、提梁卣、壶、觚、爵、觥、盘等,中原文化常见的这里都有出土,其中以鼎、甗、尊数量较多,这些器物不但炊器、酒器、食器、水器齐全,其形制也基本是中原文化常见的。这些铜器是受商文化的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如它的四足鬲^⑬、一些尊的高圈足、肩上的立鸟装饰等都有地方特点,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商文化直接传来。三星堆青铜器中仅有尊、甗、盘几类,从器形和纹饰看应属商文化的范畴而又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在接受中原商文化的影响时,三星堆文化的人们只选择了商文化青铜器中的某些器物。这种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选择标准不同也说明了他们的需要、社会意识、审美情趣等方面有所不同。

其次,城洋青铜器中,有些器物较三星堆青铜器同类器物时代早,例如甗(《报告》称A型圆甗),器形为大口外侈,高颈,斜折肩,弧腹,圈足,饰饕餮纹和夔纹(见《城洋青铜器》第2页,图三;第28页,图二九;第30页,图三一)。这种器物郭宝钧先生和马承源先生都称为甗,并有详尽考证^⑭。这种铜甗发现较早者为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郑州白家庄M2、M3都发现了这种器物(见《文物参考资料》1995年第10期,第36页,图版十一,第37页,图版十二)^⑮。郭宝钧先生和马承源先生称为甗的青铜器和城洋青铜器中的A型圆甗器形相同,它们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甗,只是白家庄2件铜甗通高分别为27.7、25厘米,城洋3件铜甗器形高大,通高分别为37.8、34、37.1厘米。高大的器形应为南方青铜器的特点。城洋青铜甗应是白家庄铜甗南传影响的结果。关于白家庄期,郭宝钧先生归属二里岗文化,定为中商^⑯,近年有学者提出白家庄期为中商文化^⑰。不过郭先生是以“它(引者按:这里是指二里岗文化)在偃师二里头地区,又压在二里头文化之上……大家都默认为此地早商文化”。大约这种意见认为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为早商文化^⑱;后者是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遗存归属早商文化,但不包括白家庄期,中商文化为自白家庄至殷墟大司空一期以前这一时期^⑲,不管如何白家庄期早于殷墟文化是无问题的。这种甗在殷墟文化一期仍然有发现,再后就消失了。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3件甗(《报告》称为圆甗,见《三星堆祭祀坑》,第263页,图一四五;第364页,图一四六;第265页,图一四七),就其形制来说和白家庄铜

甗、城洋铜甗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为大口,斜折肩,圈足。只不过城洋铜甗、白家庄铜甗腹部弧向内收,而三星堆铜甗腹部较直。纹饰方面,城洋和白家庄铜甗的兽面纹无云雷纹作地纹,三星堆铜甗的兽面纹以云雷纹作地纹,另外三星堆铜甗在肩部饰羊头、立鸟装饰,城洋、白家庄铜甗则无。三星堆铜甗通高分别为33.4、35.4、54厘米,比白家庄铜甗高大,和城洋铜甗接近。从各方面看,三星堆铜甗是在继承白家庄期铜甗基础上而又有所发展,或者说是继承城洋铜甗在纹饰上进一步发展。三星堆铜甗在中原地区未有发现,而在南方的湖北^⑳、湖南^㉑、江西^㉒等地以及陕西^㉓有发现,它们的时代都属于晚商或商末周初,应是继承白家庄和城洋铜甗在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型式。再如尊,郭宝钧先生认为铜尊系仿制陶器,“形圆圈底无足,不易立^㉔”。城洋青铜器中A型尊为敞口,束颈,圆肩,圆腹,圈底圈足,如果去掉圈足就像一个圈底陶罐。根据郭先生的意见这种A型尊可能是从陶圈底罐和早期铜甗演化而来的,郭先生提出“它(引者按:指甗)是甗、甗、尊三类未分化时的前型”^㉕。城洋的A型尊还保留了圈底陶罐的一种特征,可能是尊类较早的型式。三星堆无这种尊。

第三,城洋和三星堆青铜器中有的同类器物差异较大。城洋地区出土2件方甗,三星堆也出土1件,它们的区别明显。城洋铜甗形体高大,通高51.2厘米,方体,带盖,短直颈,圆肩,弧腹向下内收,凹底,肩饰两个牛头形耳,下腹部有羊首螭(见《城洋青铜器》,第85页,图八一)。三星堆甗器形较小,通高仅35.6厘米,方体,有盖,长颈,斜折肩,直腹,近底处圆转内收,平底,圈足较高,盖和肩部有立鸟装饰(见《三星堆祭祀坑》,第273页,图一五一)。城洋甗纹饰有夔纹、圆涡纹、焦叶纹,三星堆甗纹饰有兽面纹(以云雷纹作地纹)、夔纹等。三星堆甗双肩无耳,下腹无螭,其造型风格类似同出的甗(《报告》称圆甗)。城洋甗乃标准的形制,郭宝钧先生指出:甗的肩部两耳便于扛抬,下腹部的螭便于倾倒酒。总的看城洋甗是中原方甗的形制,和殷墟妇好墓的方甗十分相似。三星堆甗不太符合甗的形制,或可称之为方甗,应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蜀人吸收城洋方甗的形制铸造的,其纹饰和尊、甗上的纹饰也一样。商文化中方体礼器均出在王室和贵族墓中^㉖,似乎证明城洋地区和三星堆应是当时的两个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城洋和三星堆青铜器中除了差异外,也有相同之处。城洋的B型、C型尊均演变为大敞口,长颈,斜折肩,腹部相对变浅,圈足变高,C型尊的圈足底部

内收(见《城洋青铜器》第222页,图一七八,3、4)。三星堆总共出土铜尊10件,一号坑2件,二号坑8件。一号坑的龙虎尊系仿制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二号坑的尊总体上看都和城洋铜尊有相似之处(见《三星堆祭祀坑》,第242页,图一三八,第252页,图一四〇),特别是IV式、式尊和城洋C型尊的基本造型、纹饰相似之处颇多。折肩尊早在郑州商城即有出土^②,以后为商文化常见。

城洋青铜器中有一种形体较矮的甗,7件为圆肩,2件为折肩。7件圆肩的为大口,圆肩,圆腹,圈足(见《城洋青铜器》,第162页,图一四五,第163页,图一四六),三星堆也出土1件(见《三星堆祭祀坑》,第42页,图二五)。它们的器形相同。这种器形较矮的圆肩甗在中原地区是殷墟文化一期开始流行的,之后成为流行的形制,是白家庄那种甗以后的常见器形。

城洋地区和三星堆都出土有铜盘,它们的形制大体相同,都为宽沿外折,弧腹,平底,圈足。城洋出土2件,三星堆一号坑出1件,(见《城洋青铜器》,第10页,图一二,第33页,图三四;《三星堆祭祀坑》,第43页,图二六,1),其中三星堆K1:53号盘和城洋1981CHLTT:6号盘从形制到纹饰都基本相同。

以上城洋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中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礼器部分既有差异,也有相同的地方,总的看相同或相似之处颇多,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中原的商文化,差异之处体现了各自的地方特点,他们在接受商文化时选择的标准有差异,并且根据各自的需要,各自的传统,在各自的地区铸造。再加上两地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整个青铜器群的面貌差异是主要的,证明两地的先民们在信仰、崇尚、需要等各方面是各自不同。

二. 十二桥文化与汉水上游青铜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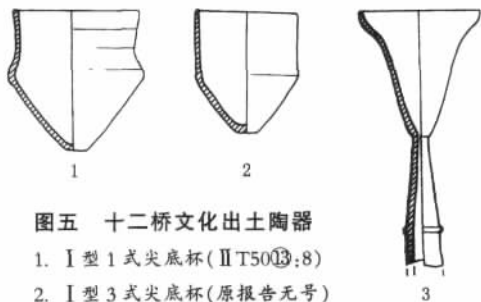
通过上面的对比分析,早期蜀文化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和宝山文化,分属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川西和汉水上游地区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的先民们就发生了联系,考古学研究也有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四川广元中子铺遗址发现一种柱状实足,和汉水上游老官台文化陶三足器足部分一样。在广元张家坡遗址发现一种泥质陶内外灰黑色心为褐色,邓家坪遗址发现泥质黑皮陶^③。黑皮陶是陶器的内外表为黑色,陶胎为暗红色,这种黑皮陶是汉水上游地区龙山文化的特点之一^④。张家坡遗址那种内外灰黑内褐陶和邓家坪遗址那种黑皮陶应是受汉水上游龙山文化的影响或直接传播而来。这种影响能从汉水

上游到四川盆北部边缘地区,再到成都平原就比较容易。

早期蜀文化在三星堆文化之后是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在成都市及周围地区已发现多处。十二桥文化时期蜀文化是以尖底陶器为其特征之一,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高柄器座等仍然存在,只是器形有所变化,尖底陶器有罐、杯、盏等。从陶器的发展演变看,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一定的缺环,月亮湾二期文化正处在它们之间而填补了缺环的一部分。月亮湾二期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比较接近,和十二桥文化仍有一定的差距。笔者曾将三星堆文化定为相当商代,月亮湾二期文化相当于西周前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后期至春秋。这里说的前期、后期都是包含了若干年在内,虽然比较笼统,却为今后进一步地研究留有余地。

十二桥文化和宝山文化显然有一个时间的差距,但正如《城洋青铜器》所说:“大约在接近商代末期,宝山文化的族体至少有一部分北迁到关中地区,发现于今宝鸡市渭河南岸的‘强国’墓葬等即为此立足、发展的文化遗存”。而强国墓“是主要续存于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强国墓地是发现有尖底陶器和尖底铜器,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在汉水上游地区继宝山文化之后有可能存在承接宝山文化而有所发展的文化遗存,大体和强国墓地同时。《城洋青铜器》还指出:“还要提及的是,两周时期,城洋一带的考古学文化仍具有地方特点”。若如此十二桥文化的一些因素也可能和宝山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十二桥文化的尖底器中, I型1、2式尖底杯器形为直口,高领,折肩,斜腹内收成极小的小平底(图五,1),这种器物虽为小平底,然底径甚小,不易直立,习惯上称其为尖底杯。这种尖底杯和宝山文化的A型小底尊形杯有相似之处,也和湖北西部以长阳香炉石遗址为代表的B型、C型尖底杯相似^⑤,相比



图五 十二桥文化出土陶器

1. I型1式尖底杯(ⅡT50⑬:8)
2. I型3式尖底杯(原报告无号)
3. I型1式豆(ⅡT40⑬:32)

之下宝山文化的A型小底尊形杯,领部突出,造型夸张,和香炉石C型2式更为接近。十二桥这类A型尖底杯可能由小平底罐演变而来,三星堆遗址第四期(属十二桥文化)“小平底罐几乎完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⑥。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宝山文化A型小底尊形杯的影响,因为宝山文化中此类小底尊形杯不仅出土数量多且贯穿宝山文化的早晚,为有代表性的陶器之一,当然不排除来自长江中游的影响。十二桥文化十二桥遗址的型3式尖底杯和三星堆四期的尖底杯,均为直口,上腹直,下腹转折内收成小平底(图五,2),这种尖底杯和宝山文化的C型小底尊形杯(图二,9)器形完全一样,它们在宝山文化中从早到晚均有出土,十二桥文化中这类尖底杯无疑应是源自宝山文化。十二桥文化中有一种型豆,上部相当豆盘的部分呈喇叭口杯状,高柄中空,杯底部有孔与中空的高柄相通(图五,3)^⑦,这种型豆在三星堆文化中即有发现^⑧,以往称之为高柄豆形器座。在宝山文化中这种器物称高柄器座,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现117件之多,早晚都有,也应是代表性的陶器之一,其器形亦为相当豆盘部分呈喇叭口杯形,高柄中空,杯底有孔与中空的高柄相通(图二,4),形制和十二桥文化的I型豆基本相同。这种器物应在宝山文化南传被十二桥文化接受。圆底陶釜在宝山文化中出土347件,从早到晚都有,圆底陶釜在十二桥文化中开始出现,本不是蜀文化的固有器物,可能来自宝山文化。这种釜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湖北西部出现较早,数量也多,有可能是陶釜的发源地。在蜀文化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吸收了一些宝山文化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

属于十二桥文化的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了两批青铜器^⑨,其中铜罍9件,有6件为中原商周时期常见的形制,器形为“广肩而锐下”,肩有两耳,下腹一侧有鼻。另3件形状“有类乎圆壶”,圆肩弧腹,肩有两耳,这种和商周常见的略异。按青铜罍在殷墟文化中出现于二期^⑩,以后到西周时期亦然盛行,在四川则一直到战国时期墓葬中仍发现。竹瓦街这6件罍器形高大,形制和城洋青铜器中的B型、D型罍(见《城洋青铜器》,第219页,图一七六,4、5、6)相似,尤其和D型几乎完全一样,唯竹瓦街有盖,城洋无,还有它们的纹饰不同。另3件的形制也见于陕西宝鸡地区的强国墓葬中^⑪。十二桥文化的这些铜罍很可能是接受了城洋青铜器的影响,或由中原地区通过汉水上游传至成都平原。

三. 简 论

关于蜀地和外地交往的通道,历来认为有两条,一条是通过长江河谷;一条是先沿长江西上至湖北溯汉水而上至汉中地区,然后南下至成都平原。这两条道路无疑是存在的。但也不应忽视另一条道路,即从陕西关中地区翻越秦岭至汉水上游地区,再南下成都平原。关中和汉水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应是有交往的,例如在汉中地区发现的李家村文化是老官台文化的一个类型,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也和关中渭水流域的相同,这就说明远古时期两地交往密切。有学者指出:“远在新石器时代,嘉陵江和丹江可能是陕南和关中古文化传播的通道”^⑫。汉中的褒河和渭河的支流斜水也是一条南北通道,当然这中间还有艰险的山道,但是通过江河河谷的交通孔道也是相当艰险的,不能设想通过江河的河谷通道要比翻山越岭容易得多,今日长江的三峡地区两岸峭壁绝岸,步行其间也绝非易事。商文化已到达关中地区,从关中找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地区是完全可能的。

城洋青铜器中属于中原文化的铜器“基本为中原系的器类,但有自己的特点”^⑬。有罍、甗、尊、鼎、鬲、簋、甗、卣、爵、斝、壶、觥、盘、及至传到蜀文化中,三星堆文化时期接受了甗、尊、盘,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又接受了圆罍。从这方面也反映了蜀文化青铜器的中原系统礼器,极大可能是通过汉水上游传入的。蜀文化接受中原系统的铜器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需要,除了器类方面的选择外,对铜罍的组合似乎也体现了蜀人的习俗、信仰和崇尚。冯汉骥先生在研究彭县竹瓦街出土铜器时指出:“此五件罍亦可视为列罍。列罍在川出土已非第一次。在抗日战争期中,亦曾出土过一套,亦为一大四小,成都古玩家至今犹能记之,惜当时即遭散失,今下落不明,出土地及情况亦不详”^⑭。列罍的组合形式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报导,除竹瓦街第一次出土者外,第二次出土铜罍4件,为一大三小,形制与第一次出土者基本相同^⑮。应是在下埋前缺失1件。这种列罍的组合形式乃蜀文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早期蜀文化和宝山文化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应是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的遗留。他们中间有交往,三星堆文化的铜器(中原文化系统的铜器),通过宝山文化传播而来。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其陶器中的相当部分是受宝山文化(其继承者)的影响,其竹瓦街出土铜罍亦受宝山文化的影响。

从蜀人参加武王伐纣这一事件来看,蜀和商、周早就发生了关系,和汉水上游的宝山文化及其后继者接触交往也是合情合理的。

蒙文通先生说:“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的雄长”。又说:“《尚书》已举出庸、蜀等八国从周伐纣,可见蜀只是很多小国中的一个,不能把它想像很大”。“汉中的褒城是古褒国,幽王时还存在的。幽王既败,郑人南迁,始有南郑之名。蜀不可能早在周初就有南郑地区”。“北与秦分应在秦穆公前后的不得在周初^⑩”。相当商代的三星堆文化不能达到汉水上游地区,明矣。十二桥文化时期蜀文化可能和汉水上游宝山文化的继承者有更多的接触,所以吸收了它们较多地影响。

(本文插图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卢引科同志绘制,特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⑧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铏固宝山》,第17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铏洋青铜器》,第246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 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④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考古》1977年第4期。

⑤、⑥ a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42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⑦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铏固宝山》,第199页附表五,第202页附表七,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23页、第1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⑩ 宋治民:《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⑪ 陈德安等:《三星堆》,第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⑫ 马承源等:《中国青铜器》,第422页、第4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⑬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铏洋青铜器》,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⑭ a.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46

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b.马承源等:《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⑮ 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⑯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⑰、⑱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15页;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第16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⑳ 彭锦华:《长沙郊区出土的大型铜尊》,《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㉑ 岳阳市文管所:《岳阳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84年。

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㉓ 陕西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第78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㉔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㉕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4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㉖、㉗ 刘一曼:《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第191页,图七七,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㉙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沿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㉚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南考古报告集》,第7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㉛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发掘》,《文物》1995年第9期;b.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㉜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1期。

㉝ 四川省文管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又成都金沙遗址也有发现,见《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20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下转第077页)

参考资料:

① Chirino,Pedro,S,J,(1969) Relacion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he Philippines in 1600).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XV, Manila.

② Lyon, Eugene, (1980) The Treasure of the Concepcion (An Essay). Copyright John Shedd Aquarium, Chicago.

③ Muckelroy, Keith, (1978) Maritime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① 吴春明:《近古欧亚航路网络中的沉船考古》,邓聪、吴春明《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I,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 (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 1993.

③ 上海博物馆:《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④、⑧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

⑤ Alya B. Honasan, The padanan junk: the wreck of a fifteenth century junk is found by chance in a pearl farm off pandanan island.

⑥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⑦ 吴春明:《怀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⑨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IJNA (1992) 21.

⑩ 袁晓春:《略谈蓬莱元朝沉船及登州港》,《海交史研究》,1990年(2)。

⑪ Robin C.M.Piercy,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preliminary report, 1977, IJNA (1977).

⑫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Intakosi, The Kosi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1985, A progress report. IJNA (1986) 15.2.

(上接第053页)

③③ 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图十四,2,《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③④ 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b.冯汉骥:《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c.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窑藏》,《考古》1981年第6期。

③⑥ 尹盛平:《西周的弓鱼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一九八一),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1982年。

③⑦ 魏京武:《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③⑧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碱洋青铜器》,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⑨ 冯汉骥:《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④⑩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窑藏》,《考古》1981年第6期。

④⑪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0页、第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